

口述历史：重建社群文化的可能

——基于盐业社群口述历史实践的思考

王小平

【摘要】口述历史是现代史学的新发展，作为一种话语实践，日益成为一种流行的文化表征方式，其在怀旧心理的营造、历史体认与社群文化建构、社会赋权等方面显露出重要的意义。百年来，盐业社群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伴随而来的是同乡会的式微与传统行帮组织的消失，工会组织的发展壮大以及盐业社群的离散状况。百年社会变迁，举国盐业兴衰，个体生命沉浮，盐业口述历史呈现的是三者的交织面貌。作为历史与记忆的载体，盐业社群口述史在呈现诸多历史变迁的同时，亦担负起盐业社群文化重建的重任。盐业社群口述历史项目通过“说吧，记忆”：自我肯定的生命故事、活态记忆展览、创意工业遗址摄影和口述历史进博物馆等形式的尝试，致力于盐业社群文化的重建。

【关键词】口述历史；盐业社群；文化重建；活态记忆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6）07—0125—05

口述历史是现代史学的新发展，作为一种话语实践，它日益成为一种流行的文化表征方式，其在怀旧心理的营造、历史体认与社群文化建构、社会赋权等方面显露出重要的意义。更为重要的是，口述历史作为传统文献的对应物，既有印证传统文献的作用，又是传统文献的他者，在很大意义上补充历史细节，丰富了历史面貌。作为活态历史记忆，口述历史与固化的历史记忆产生巨大的张力，对于因为生活急遽变迁而遭到破坏的社群文化，具有很大的修复能力和重建能力。

保尔·汤普逊在著名的《过去的声音：口述史》开篇，即聚焦于历史与社群之关系。他说：“整个权力结构就像一台巨大的录音机，按照自己的形象塑造过去。”^①通过社群口述历史，可以“看到社会变迁在细枝末节上带来的冲击……社会环境的总体变革如何改变传统社群中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和各种关系。”^②通过口述历史访谈，还可以获得历史的鲜活维度：即所谓过去，不仅仅是众所周知的，而且还是亲身感知的。他认为“口述历史方法的合作性本质引发对历史与社群之间根本关系的质疑，历史信息不必放诸社群之外，由专业历史学家来阐释和呈现。通过口述历史，社群能够，而且应该有信心书写他们自己的历史。”^③

保罗·康纳顿说：“或多或少属于非正式的口述史，是描述人类行为的基本活动。这是所有社群记忆的特征。”^④口述历史因其扎根社会基层，深入大众生活本身，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充满情感，对于社群文化的构建具有弥合作用。盐业社群口述历史关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不同个体的生命历程，它饱含“作为社会发展进程的大众记忆”。^⑤与四川盐业息息相关的盐工日常生活、工作场景和社会大事件，如工运、抗战捐金、日军轰炸、政治运动等，以及盐厂的更名、改制、技术革新、福利与劳保等一系列口述史料，构筑了本土盐业社群的共同记忆，更是社会发展进程的缩影。

* 本文系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记忆与历史的对话：川盐古道口述史研究”（编号：SC15E013）、“工业遗产与文化创意产业融合研究”（编号：SC15XS011）和中国盐文化研究中心项目“自贡盐业口述史料采集与整理计划”（编号：YWHZ12—0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王小平，男，1974年生，四川德阳人，四川理工学院口述历史研究所所长、副教授，中国盐文化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四川自贡，643000

一、变革中的社群：盐业社群的个案描述

四川是中国井盐的发源地和主产区，产盐历史逾 2000 年，分布在全省 16 个地（市、州）的 54 个县市。至民国初，计有盐场 27 处，盐工 10 万余众，分属川南、川北盐业稽核分所；迨至上世纪 90 年代，有国有制盐企业 26 个，其中大中型企业 8 个，主要集中在自贡、乐山和遂宁三地，盐业工人有 5 万多人。可见，四川盐业社群是一个分布面广，数量庞大的群体，四川盐业社群承载并丰富着本土文化的集体记忆。

1. 同乡会的式微与传统行帮组织的消失

行帮组织是盐业社群的重要组织形式，同时承担了世俗利益与信仰体系双重功能。清乾隆以来，作为盐业商人和盐业手工业者的同业组织逐渐发展起来，在盐业社群中发挥着凝聚同行，维持共同利益和营造归宿感的多重作用。这些行帮组织主要有盐商的同乡会和盐工的行会，以及各种如袍哥那样的帮会组成。

四川盐业社群的行帮出现于清乾隆以后，犍、乐和富荣盐场集中地，开始建立起以行业和工种形成的盐工行会组织，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富荣盐场烧盐工人的“炎帝会”，挑水工人的“四圣会”，山匠工人的“普贤会”，以及犍乐盐场采卤、运卤和烧盐工人组织的“大蜡会”等等^⑥。到民国初年，自贡盐场的工人已按工种不同逐渐形成“十大帮”，即山匠帮、机车帮、车水帮、山笕帮、烧盐帮、牛牌帮、转盐帮、捆盐帮、装盐帮、扛运帮^⑦。

至上世纪 40 年代，自贡地区有行帮 40 余个，而在渝东地区竟多达 50 余个。这些行帮往往以行业神为号召，构筑各自的信仰体系，在盐业体系中自成一体，具有巨大的影响力，从监督会众，控制新会员的登记，掌管工人的入职，到涉足纠纷解决，组织罢工，与官府和资方交涉办理工资和福利申诉等等^⑧。行帮组织对盐业社群的影响力巨大，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人员数量所决定，“盐工加入帮会的约十之七八。”^⑨随着国民党、共产党先后都在盐业社群中建立和扩展自己的工会组织，这些行帮组织日趋式微，许多行帮逐渐消失，至解放前夕最后一个行帮组织“炎帝会”也停止了活动。

同乡会是以地缘关系建立起来的同乡组织，会馆是其活动的固定场所。始于清朝初年，大批商人和技术工匠从全国各地来到四川各地盐场，如陕西、山西、福建、浙江、贵州、江西等地，其中以陕西商人为盛。随着外来盐商的增加，作为联络乡人、商业议事、维护共同利益的同乡会也日益发达，并逐步发展为以会馆为中心的活动组织。其中，西秦会馆是陕西商人的聚集地，广东人则建有华南宫，湖南湖北人建有禹王宫，福建人建天后宫，贵州人建霁云宫。这些同乡会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以乡籍乡情为纽带，一方面发挥着乡人维护共同商业利益的作用，同时，也维持了乡人的共同情感和文化习俗，一定程度凝聚了社群情感，营造了归宿感，稳固了共同体。随着社会的变革，至解放前夕，各地同乡会均渐渐式微。

解放前，袍哥组织十分兴盛，“袍哥势众人杂，其它各种行会，帮会的会众都可参加袍哥，有的甚至是集体参加。帮、会之间也相互混杂，彼此渗透。”^⑩口述资料里面也有反映，解放之初，“以前当袍哥的地下党曹焕章就在那里当局长，他喊我们还是喊兄弟兄弟，我们喊他五爷五爷，因为讲码头来说，我们是兄弟伙。”^⑪

帮会组织由于其所处的特定的历史环境所限，它毕竟只能是一种松散的民间组织，不管它出于何种动机而产生过这样或那样的影响，但随着滋生它的那种土壤的消失，它也就随之消失^⑫。

2. 工会组织的发展壮大

在盐业社群中，共产党和国民政府先后都建立了自己的工会组织。国民政府 1935 年始在自贡东西两场组织起盐工工会——“自贡盐业产业工会”，至 1941 年，四川省盐业工会筹备委员会核准成立，在全省成立了 22 个盐场工会组织，会员达 98660 人^⑬。共产党早在 1926 年就在自贡建立了中共自流井特别支部，发展工人组织，领导工人运动，至 1927 年成立自贡市工会，1941

年“皖南事变”后，由于政治局势变化，工运委员会成员先后撤离自贡。建国后，四川盐业企事业单位均建立起基础工会组织，据1985年统计，四川盐业系统共有37个基层工会组织，会员人数占职工总数的99%以上⁹。

建国后，工会组织在盐业工作中的作用巨大，在盐业生产和社群生活中具有很大的影响力。据口述资料显示，“解放前有个工会，工会不起作用，”“解放以后工会说话就说了算，工人有什么问题就通过职工代表和资本家进行磋商，就像劳资协商会。”⁹工会组织负责与资方协商人事、待遇等问题，所谓“工会是工人的组织”，新入职的工人要申请加入组织，遇父母亲人过世，工会还负责安葬⁹。工会组织评选和奖励劳动模范，“过后每个月给我100块钱的模范奖金，每年地区工会还要给我们700块钱。”⁹作为工会干部的付家顺，组织东风盐厂的修建，1959年，带领几百人会战“蓬基井”，参与修建蓬莱盐厂⁹。据富顺三台盐厂李绍敏回忆：“开始是工会筹备委员会，之后才改成基层工会。基层工会过后，富顺盐厂才成立了个工会，是这么回事。开始筹备委员会我就当文教委员，后来把我选成组织委员。组织委员干啥呢？有个工会主席嘛，工会主席过后就是组织委员。主要干啥子？就是组织工人搞好生产！就是这个意思。”⁹

3. 盐业社群的离散状况

但是，上个世纪80年代末以来，随着股份制改革的全面推进和小盐厂的政策性关停，人员分流，“改制”、“买断”、“内退”、“下岗”成为这一时期频繁出现的新名词，在我们的口述材料中，多有记载。因此，90年代以来，盐业社群呈现出离散状况。解放后持续多年的以盐厂——工会为依托建立起来的盐业社群紧密结构被打破，难以为继，而新的社群结构尚未形成。

四川盐业开始股份制改革，最先进行的是乐山五通桥盐厂。1987年11月25日，五通桥盐厂同中国轻工物资供销总公司、中国盐业总公司、四川省盐业公司、北京华轻实业开发公司达成协议，由五家共同发起组建成立“四川峨眉盐化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并于1988年6月1日正式成立。除上述五家公司外，加上云南生产资料服务公司，共计六家成员单位，此外还有六家持股企业和八家控股企业。1993年3月，四川峨眉盐化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正式上市，成为川内首家上市公司。1991年3月，成立四川久大盐业（集团）公司，自贡所属自流井盐厂、贡井盐厂、大安盐厂、舒平盐厂、邓关盐厂等悉数改组久大盐业公司；随后，蓬莱盐厂改制为四川蓬莱盐化有限公司，后又成为四川久大盐业（集团）公司下属子公司。至此，四川三大盐产地全部完成股份制转型，其余年产量在10万吨以下的小盐厂被政策性关停。至2002年，遂宁保升盐厂、大邑县盐厂和资中县双河盐厂等几个小盐厂关停。

二、盐业口述历史：打捞活态记忆

口述历史作为较为科学、规范的活态记忆采集、整理和研究工作，是一项历史记忆的打捞工程，其深入生活、扎根底层的精神，对于复原历史面貌，再现历史情境，展示历史的多元面相具有真真切切的作用。

活态记忆是区别于固化记忆的一种记忆形式，是现实中留存下来的鲜活历史记忆，通过现实空间和活生生的人而保存下来。传统的固化记忆包括传统的志、史文献和档案文献，通过一系列的采集、筛选、统计和书写，这些历史记忆已经被固化下来，成为凝固的、稳定的记忆。活态记忆因其现实、可感，与人直接相连，往往可与传统固化记忆形成互补和互证。

对四川本土盐业活态记忆的收集、整理主要是上世纪60年代初开始由四川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采集整理的盐业口述材料，它们大多根据建国以后盐业企业家、工人的回忆整理而成，出版于上世纪60年代初，文革期间一度停止，80年代以后恢复出版。这些成果集中在《四川文史资料选辑》、《四川文史资料集粹》、《自贡文史资料选辑》和《荣县文史资料选辑》等各地文史资料汇编中，此外也包括80年代以来组织编写的“厂史”、“厂志”，如《自流井盐厂志》（1994），以及“盐业志”，如《四川省志·盐业志》（1993）、《自贡市盐业志》（1995）等。1976年《井盐史通讯》创刊后，曾开辟过“老盐工回忆录”专栏，发表过一些经过整理的盐工口述文字，这些活态记忆材料都为盐业史研究提供了大量珍贵而不可复制的史料。

按照严格意义的现代口述史学来看，“这些调查所采用的方法和取得的收获，绝大多数都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口述史。”⁹因为一切口述历史固然都是访谈，但不是一切访谈都是口述历史。这一时期的口述文史资料，往往因为其较为鲜明的意识形态和价值判断，在采集与整理过程中，通过剔除、筛选和隐匿，无法体现出口述历史的生动性、大众化和多元性。因此，现代口述史学意义上的盐业口述史料的采集和整理研究尚未真正提上日程，四川本土盐业口述史在当代盐业历史研究与构建独特本土文化记忆方面的重要作用尚待学界的重视。四川盐业口述史计划通过本土盐业口述史料的采集与整理研究，抢救目前健在的老盐务工作者的“三亲”资料，书写当代盐业口述历史，实现构建盐业社群共同记忆，保存地方文化记忆的目标⁹。

因此，在过去的两年多时间里，我们实地走访了四川大部分盐业产地，共寻访老盐厂14座，分别为：自流井盐厂、大安盐厂、张家坝制盐化工厂、贡井盐厂、邓关盐厂、五通桥制盐化工厂、犍为盐厂、大同盐厂、大邑县盐厂、蓬莱盐厂、南充盐厂、三台富顺盐厂、射洪东风盐厂、资中双河盐厂等。按照目标式抽样和滚雪球抽样方法，共寻访老盐业工作者100余人，完成口述访谈40余人，计60余次。采集口述录音3000余分钟，收集老照片、旧物件等影像资料800余件，整理完成转录抄本40余万字。需要说明的是，限于人力、物力和财力，我们的寻访以盐业生产为中心，所访对象主要是老盐工——老的盐厂工作人员，故未将储运、购销、矿山开采、税务、科研、管理机构等工作人员纳入访谈范围。

在实地走访、口述访谈、抄本整理和后期口述历史汇编的制作与文献对照的过程中，我们时常眩惑于“真实的过去”、“记忆过去”与“历史书写的过去”三者之间的芜杂往复。盐业口述历史蕴含着基于实际生活、良知和普通人思想情感的历史知识，它是历史事实在亲历者头脑里的反映和留存，属于意识、观念的范畴。不过，这种意识和观念既是历史事实的客观投影，又是每一个亲历者的情绪、情感、态度、价值观、文化素养等主观因素在历史影像上的自然流露。研究者的一个重要工作是对之加以发掘和客观再现，因此，盐业口述历史融会了客观与主观、社会与个体、理性与感性的极其丰富的精神世界⁹。

三、基于口述历史的社群文化重建

“不论哪个社群，假如它的成员不关注并将精力和资源奉献给共同的事业，它亦不能长久生存下去。”⁹盐业口述历史倡导参与性历史构建，坚持并贯彻“从社群来，到社群去”的原则，“将历史引入社群，同时，也将历史带到社群之外。”⁹亦即口述历史为社群带来了历史意识和观念，同时，把社群自己的历史收集、整理、保存和传播出去，活化了社群的集体记忆，稳固了社群的共同价值，扩展了社群的影响力。

在盐业社群口述历史的实践工作中，我们不断尝试更加多样的形式重建社群文化，寻找口述历史与社群文化建构的有效途径。目前，我们在尝试的形式有：“说吧，记忆”：自我肯定的生命故事、活态记忆展览、创意工业遗址摄影和口述历史进博物馆等几个方面。

（一）“说吧，记忆”：自我肯定的生命故事。“说吧，记忆”系列是我们开启访谈者讲述生命故事的主要形式。通过发现、访谈、回馈和互动，在访谈者与受访者之间建立起桥梁，增加了信任，越来越多的受访者在访谈中表现出对自我的肯定和对社群的认同感。更为重要的是，社群口述历史帮助没有特权的人，特别是老人渐获尊严和信心，增进社会阶层之间、代际之间的接触和理解。在我们的口述历史采集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受访者讲出了自己的人生故事，在这些波澜不惊的故事背后，蕴含着某种意义的自我确认。在家庭环境的访谈过程中，受访的老人在子女、家人面前谈笑风生，对自己的人生经历侃侃而谈。已经有老人在接受访谈后开始着手撰写自传性回忆录，也有老人开始帮助联络过去的同事，与访谈者保持着良好的沟通。

（二）活态记忆展览。通过前期的访谈，将采集到的录音、录像和图片资料加以有效利用，活态记忆展览是我们采用的主要方式。活态记忆展览分为面向大众的公共展览，和面向相关社群的内部展览，其中，面向大众的展览具有很好的宣传性，让大众——特别是年轻一代认识、了解社群历史；而面向本社群的展览则是唤起记忆和情感共鸣的有效方式，在社群内部能够激发怀旧的情绪，营造集体感，并激发参与热情。目前，我们采用的展览主要依托视频和图像——人物肖像墙、纪录片和访谈花絮等展览形式，当然，适当的文字介绍在直观的图像背后打开了深入历史和冷静思考的面相。

（三）创意工业遗址摄影。为了给现代工业文明的物质化外壳——工业建筑物——赋予意义，通过口述历史活动，我们让工厂的修建者，几十年如一日在其中劳作的工人来讲述建筑物的来历和历经的变迁。同时，通过采集工厂建筑遗址影像，让工厂的记忆完整地保存下来，劳动者与其生活息息相关的建筑物被赋予了生命气息。

面对百年盐业的兴衰历史，如何更加艺术化地表现盐业社群的历史观念和文化意识，目前，创意工业遗址摄影是我们正在尝试的一种表现形式。通过模特的加入，把“人”置于“物”——工业废墟之中，辅以道具，在物与人的前景化与背景化转换之间产生出巨大的张力，以视觉导向思索，激发出观众有意味的思考。在名为“井盐·合奏”创意工业遗址摄影系列中，我们将之分解为“井盐·天车·鼓篇”、“井盐·庙·钹篇”、“井盐·馆·唢呐篇”、“井盐·古道·锣篇”和“井盐·厂·小号篇”五个篇章。天车、庙、馆、古道、厂，每个篇章代表盐业社群的一种文化遗存，而辅以一种中国传统乐器来表现，每种乐器又与一种具有文化意味的遗存相匹配，这样，五种乐器就构成一部历史大合奏。

（四）口述历史进博物馆。留存本土文化记忆，奠基口述历史博物馆，是我们开展盐业社群口述历史的初衷和目标之一。口述历史是正在消失的不可再生的文化遗产，这些历史记忆如果不收集整理和保存下来，随时会随着亲历者的去世而蒸发、消失，传承下去则对形成人类共有的历史记忆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在2012年召开的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上，全国政协副主席林文漪指出：文化部、国家文物局等部门正在进行专题研究，积极推进中国口述历史博物馆建设等相关工作。可见，口述史料的采集与整理研究是文化强国战略的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意义和现实的迫急性；而盐业口述史即是我们结合四川本土文化资源，为建立地方口述历史博物馆开展的奠基性工作。

过去的几年，通过学术交流活动，我们的口述历史实践对盐业历史博物馆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长期以来，作为专业性的盐业博物馆，其在馆藏类型上比较固守传统，不注重对口述史料的采集、整理、研究和馆藏。目前，他们也开始意识到采集和利用口述史料的重要性，强调“应尽快对在世的老挑夫、背夫和船工做深入的访谈工作，做好口述史的研究。”^①2014年4月至9月，自贡市盐业历史博物馆联合多家机构，组织研究人员开展了长达85天的“寻访川盐古道”学术考察，采集口述史料，对曾在民国时期及新中国成立初期运输过川盐的老盐工、背（挑）运食盐的力夫等进行访谈，采集口述史料。共访谈40余位报道人，年龄最大的92岁，平均年龄约72.6岁，访谈录音90小时，录像996分钟^②。在此背景下，口述历史进入盐业博物馆，丰富博物馆馆藏，将盐业历史生动化和细节化，让冰冷的“物”和科技富有人的温度和气息，应该是可以期待的。

诚如著名法国历史学家莫里斯·埃玛尔说：“历史就是个人经历与集体记忆的构建。”如果说历史是属于人类的，那么，历史就应该回归到历史真正的主体——人，它首先要回归到每个真真切切的个体。长期以来，由文献主导的固化记忆主导着历史叙述，通过一系列的采集、筛选、统计和书写，这些历史记忆已经被固化下来，成为凝固的、稳定的记忆。这些固化记忆被确认为历史的毋庸置疑的表述，代表着主导权力和知识精英的立场，是上层的历史，而普罗大众和芸芸众生往往成为他者，被排斥、遗忘，从而隐匿在历史的深处。活态记忆的打捞就是执着于还原原初历史情境，重返历史现场，并在亲历者的历史回顾和温习中重塑社群的文化记忆，还普通历史参与者以尊严，确认他们的历史主体性。

注释：

①②③④ Paul Thompson, *The Voice of the Pas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4, p. 10, p. 17, p. 23.

④ 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3页。

⑤ R. Johnson and G. McLennan, *Making Histories: Studies in History Writing and Politic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2, p. 242.

⑥⑧⑨⑩ 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四川省志·盐业志》，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年版，第258、258、261、259—260页。

⑦⑩⑬黄建：《行帮与自流井盐业》，《盐业史研究》1991年第2期。

⑨自贡市档案馆、自贡市总工会：《自贡盐业工人斗争史档案资料选编（1915—1949）》，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⑩⑬苏国良（1932年生，邓关盐厂）口述，王小平访谈，2015年6月17日，邓关盐厂。

⑬王志高（1929年生，自流井盐厂）口述，王小平、黎鹏访谈，2012年5月24日，自贡市自流井区郭家坳某小区。

⑬安礼先（1930年生，南充盐业公司）口述，王小平访谈，2013年8月15日，南充市顺庆区什字街某小区。

⑬付家顺（1930年生，蓬莱盐厂）口述，王小平访谈，2013年8月13日，遂宁市大英县蓬盐大院。

⑬李绍敏（1931年生，三台富顺盐厂）口述，王小平访谈，2013年8月17日，绵阳市三台县富顺镇。

⑭定宜庄、汪润：《口述史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页。

⑭⑭王小平：《盐业口述历史与本土文化产业发展》，曾凡英：《盐文化研究论丛》（第7辑），巴蜀书社2014年版，第41—46、41—46页。

⑭丹尼尔·贝尔：《社群主义及其批评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页。

⑭邓军：《川盐古道研究刍议——基于川盐古道的实地考察》，《盐业史研究》2015年第2期。

⑭周姝：《川盐古道“风韵犹存”：专家学者谈考察古盐道收获》，《自贡日报》2014年12月18日。